

笔记1

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 萨米尔·阿明访谈录



我们现在 需要马克思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2018) 生于埃及开罗, 去世于法国巴黎。这两座城市并没有对萨米尔·阿明的生活起到决定性影响, 他选择了另一座城市作为基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萨米尔·阿明正是在达喀尔主持了第三世界论坛 (Forum Tiers Monde)。在这里, 他向窗外望去, 看到了当今世界的危机, 也看到了可能性。萨米尔·阿明是以非洲人的身份理解世界的。

1952年, 当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带领自由军官推翻了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君主制, 并将埃及引向不结盟道路时, 萨米尔·阿明正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胜利鼓舞了阿明, 尽管他担心横亘在面前的障碍。在阿明的论文中, 他认真思考了祖国及其他遭受殖民掠夺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对阿明来说, 第三世界深受窃取、掠夺、去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交换等问题之苦。新第三世界国家 (其中就有纳赛尔治下的埃及) 的政策空间捉襟见肘。解放事业是艰难的, 打破垄断资本主义的枷锁, 摆脱殖民主义的伤害, 走向势在必行的社会主义未来, 都需要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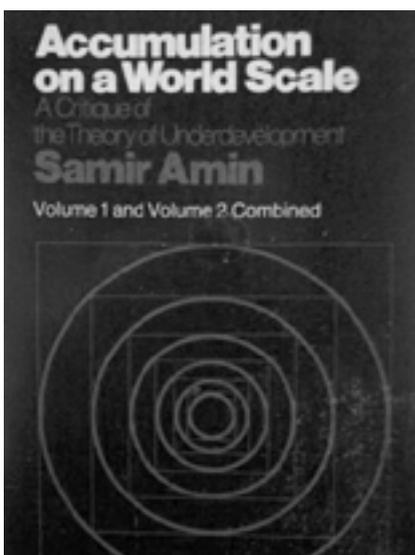


与印度的阿舒克·米特拉 (Ashok Mitra) 和巴西的塞尔索·弗塔多 (Celso Furtado) 等同龄人一样, 阿明并没有立即进入学术界。他回到开罗, 在纳塞尔的经济管理学院工作 (1957-1960 年), 然后去了马里的巴马科, 在计划部担任顾问 (1960-1963 年)。阿明会深情地谈到那些年, 谈到他努力推动祖国和其他非洲国家发展进程的体会。世界强国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 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设置的限制使埃及和马里等国根本无法取得重大突破。阿明的第一本书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是关于马里、几内亚和加纳的发展经验。它警告人们不要轻率地相信进步。世界上的不平等制度导致强者渔利, 弱者受穷。



在阿明最重要的著作《世界规模的积累》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0) 中, 他展示了资源从边缘国家通过他称为“帝国主义租金”的过程流向核心国家并使其更富有。当该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变化时, 阿明从经验和理论上追踪了这些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 他写了《脱钩: 迈向多中心世界》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1985) 一书, 他在书中呼吁边缘国家摆脱核心国家的发展议程和压力。

随着苏联解体,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阿明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帝国”, 一个将导致严重不平等、劳动力不稳定, 农业破坏及政治宗教风险的新时代。阿明在 1992 年所追寻的东西在 20 年后变得清晰起来, 他在 2013 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 (*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中重新审视了同样的主题。垄断企业榨取了这个体制的生命力, 把商人变成了“带薪的仆人”, 把记者变成了“媒体界的教士”。一个无以为继的世界体系, 金融占了统治地位, 人们的工作朝不保夕, 人类的未来似乎岌岌可危。他研究了整个世界, 对于像吸血鬼一样榨干全世界的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体系目前尚无现成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要把人类逼上绝路, 我们面前还有其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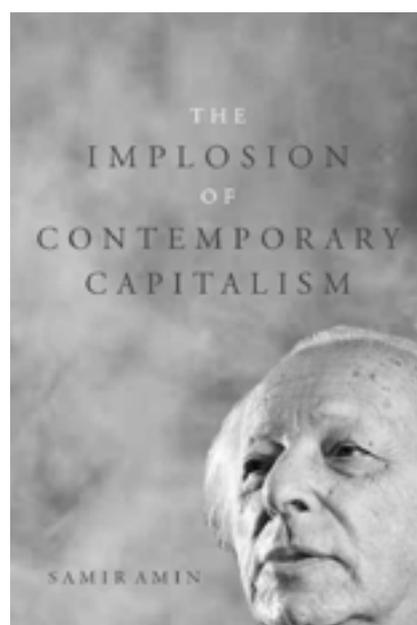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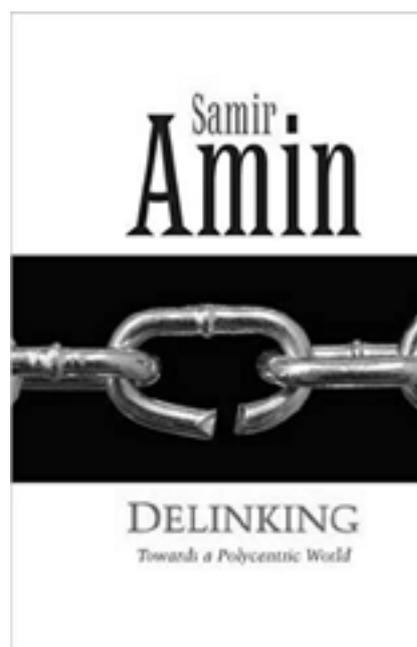


在他最后的文章之一中，阿明思索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总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或者是竞争阶级同归于尽。”他写道：这句话“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思考的主要方向。”他不喜欢失败，他写道：“不间断革命仍是边缘国家的议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恢复工作并不是不可逆的，帝国主义阵线从中心薄弱环节破裂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严酷、丑恶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斗争从未失败，未来仍是未知的。他引用黎巴嫩马克思主义者马赫迪·阿梅尔（Mahdi Amel, 1936-1987）的话说，只要反抗，我们就是自由的。



阿明去世不久前接受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吉普森·约翰（Jipson John）和吉泰什·P·M（Jitheesh P. M.）的一次长时间采访。这次采访被编辑成第一辑《笔记》。本辑《笔记》阐述了阿明对“全球化”概念的评价和他的“脱钩”概念。本辑笔记旨在成为革命斗士讨论现状和前进道路的基础。

当被问及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时，阿明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有意义。19世纪中叶出版的任何文本都比不上《共产党宣言》对当今世界的意义。它描述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诸多特征，这些特征与现在的情况仍然息息相关。**我们现在需要马克思。**当然，我们无需重复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言论，我们应该坚持运用他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对当前的挑战给出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正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一样，阿明对全球化的评价及他的脱钩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个访谈是他对于一系列问题毕生思考的提炼，这类问题激励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因此，为了向我们的朋友萨米尔·阿明致敬，我们荣幸地将他与我们团队的谈话作为我们的第一辑笔记发表。



全球化

J&J: 你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社会进程的?

阿明:

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维度。你们印度人比任何人都清楚。从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结束,印度被英国征服和殖民,这也是一种全球化。不是你们想要的全球化,但你们已经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殖民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印度人民反抗殖民,并重获独立,领导他们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领袖,而是甘地、尼赫鲁等民粹主义领袖。

1947年的印度独立有两个代价。首先,印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从印度分裂出去了。这是殖民者犯下的罪行。其次,印度独立的果实后来被国大党领导的印度资产阶级占有,国大党拥有包括少部分工人阶级在内的广泛群众联盟。



如今普遍流行的说法是,二战后的全球化是两极分化的:一方是美国,一方是苏联,双方在冷战中对峙。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二战后的全球化,也就是1945年到1980年乃至1990年的全球化,我称之为**谈判全球化**(Negotiated Globalisation)。我所说的“谈判全球化”是指亚非的政府和人民、美苏及其盟国构成了一个支配世界秩序的多极谈判体系。这种体系施加于帝国主义,迫使它适应因1917年俄国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和1955

年万隆会议所产生的新兴力量联盟。自万隆会议时期起步的工业发展并没有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而是由南方国家人民的胜利推动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加纳与坦桑尼亚等国赢得了独立。谈判全球化是由四个不同的历史性集团产生的，它们彼此抗衡：

(1) 美国、西欧的帝国主义联盟及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国。

(2) 苏联及其东欧盟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属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至少从 1950 年起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政策。

(4) 1961 年创立不结盟运动 (NAM)，1955 年在万隆会晤的国家。在万隆，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人民的代表首次在印尼会晤。当时印度重获独立才几年，中国共产党入主北京也才几年，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重获独立也才几年。这个阵营不仅包括亚洲国家，也包括当时大多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前葡萄牙殖民地后来加入了，南非更早些也加入了。古巴是加入这一集团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第四类国家的民族民粹主义政权在不结盟运动（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协调政治路线）和 77 国集团 (Group of 77, 即联合国内部的南方集团) 中在体制上联合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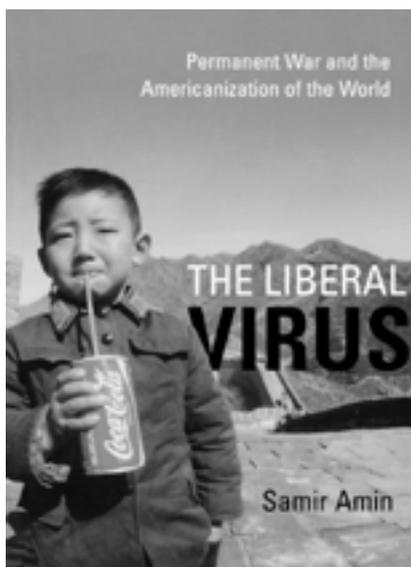
我们曾有过一个多极的全球化模式，这是四个集团之间谈判的结果。从亚非人民的视角看，这是帝国主义被迫作出让步，接受印度等亚非国家的民族、人民诉求的时代。不是南方国家适应全球化的需求，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被迫适应我们的要求。多极全球化的各方都形成了各自的发展形式。

(1) 由于工人阶级的胜利，西方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福利国家模式。

(2) 社会主义集团（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3) 第三股力量，国大党领导下的印度、纳赛尔治下的埃及以及非洲、中东其他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这三股力量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达到了历史极限，随后瓦解。有些瓦解是残酷的，比如 1991 年的苏联解体。苏联不仅被分裂成 15 个共和国，而且大多数都转向了欧洲的轨道，有些加入了欧盟和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共产主义在东方的挫折并没有导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甚至社会民主主义也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人变成了社会自由主义者，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采取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政治基本面，承认这样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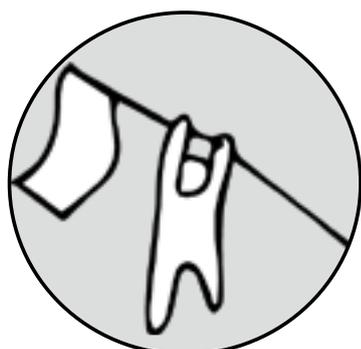


观点：一种“低强度的民主”，也就是一种由重金支持选举的民主，掩盖了阶级政治（参见我在 2004 年写的《自由主义病毒》（*The Liberal Virus*））。现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执政党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右翼政党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这意味着老牌保守派和老牌社会民主党人如今都与**全球垄断资本结盟**（见下文）。

第三股力量，也就是我们这支力量，也以各种方式瓦解了。某些地方发生了政变，某些地方（比如印度）的统治阶级偏向了右派，承认所谓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条件和模式。这是从英迪拉·甘地时代开始的。埃及的情况与此类似。1970 年纳赛尔去世后，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声称，我们不相信所谓社会主义的“谎话”，应该重回资本主义，与美国等国家结盟。

中国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转向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但有着符合其自身需要的特性。中国与印度的区别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保持执政地位的政治特性，而且在于其社会经济特性。中国和印度的巨大区别在于，中国早已经历了激进的革命，而印度还没有。

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正是这三种体系，即西方所谓的社会民主体系、苏联体系和万隆体系的瓦解为帝国主义采取攻势并实施其新的全球化模式提供了一切条件。



J&J: 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有什么特点?

阿明:

帝国资本主义不断增强的攻势不仅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实际上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挫折有关,也与欧、美、日等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有关。

这里的关键术语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 (Global Monopoly Capitalism)。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有两个发展阶段。

(1) 垄断资本的第一个阶段是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约翰·霍布森 (John A. Hobson)、鲁道夫·希尔费丁 (Rudolf Hilferding) 等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垄断资本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垄断资本具有国家性质。那时有英帝、美帝、德帝、日帝、法帝。列宁在 1916 年的帝国主义研究中写道,这些帝国主义势力不仅征服控制了边缘国家,而且他们之间也存在内斗。他们的内讧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从最薄弱环节的准边缘国家俄罗斯开始,然后是真正的边缘国家越南和古巴。西方没有发生革命,美国、西欧、日本的议程上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的垄断资本先是缓慢地,然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突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称之为广义垄断资本阶段。垄断资本的成功足以将其他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置于其分包商的地位。这意味着,人类活动创造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资本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吸收。在这种新的全球化中,我们这些国家被邀请成为帝国主义的分包商。这在印度的例子中是显而易见的。以班加罗尔为例,它发展成了英美垄断资本以及欧洲、日本垄断资本最有希望的分包地区。

我们有必要澄清,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机器是不会解体的。事实上,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也需要国家机器。国家已经被驯服到专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了。从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利用政府的方式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所谓的英国、法国、德国国家共识状态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说市场力量取代了国家是无稽之谈。拥有军队和警察部队等工具的国家对全球化进程至关重要。

J&J: 全球化给南方国家带来了哪些挑战?

阿明: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努力寻找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必须是合格的。早期是印度等国家的殖民全球化。在我们的胜利,即印度人民的胜利,及中国等国人民的胜利之后,我们有了**谈判全球化**。如今,我们又回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G7)单方面决定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接受这种全球化模式,不对这种全球化抱有幻想。对非洲国家来说,这种全球化意味着对本国石油、天然气、矿产以及耕地资源的掠夺。对印度来说,就像对拉丁美洲和南亚等许多国家一样,这种全球化表现出其他形式,包括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通过为帝国主义制度提取垄断地租来转移在我们国家创造的价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J&J: 《月度评论》(Monthly Review) 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写道,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不是社会主义,要不就灭亡,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山穷水尽。你写过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你是在说资本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吗?是什么让资本主义成为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

阿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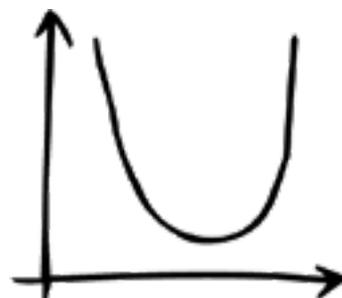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结构性危机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降至之前30年的一半。从那以后,这些国家再也没有复苏。这意味着危机仍在继续,甚至年复一年地加深了。因为德国或任何国家的增长率从1.2%上升到1.3%就宣告危机即将结束,这是可笑的。

这是一场系统性危机。这不是 U 型危机，而是 L 型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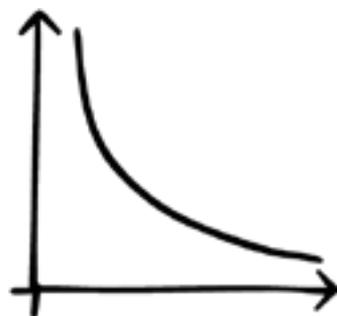
U 型危机: 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它表现的事实是，最初导致衰退的理由同样可以通过结构微调来恢复增长。这场危机的曲线像是字母 U 的形状：先是下行，经过一段时间，再次上行。

L 型危机: L 型危机意味着经济体系无法走出衰退，下行后并没有上行曲线。唯一的出路是改变制度，结构微调是不够的。现在已经到了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时候。

衰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资本主义不会坐以待毙，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维持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霸权，它的行为会越来越野蛮。这是问题的根源。我不理解“战争危险史无前例”这种说法。战争开始于 1991 年，即苏联解体后不久。第一声枪响发生在 1991 年的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在 1991 年到 2001 年间的解体把这场战争带到了欧洲。现在，在我看来，欧洲体系本身已经开始发生内爆。这不仅体现在紧缩政策的负面结果上。它们对人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增长，也就是帝国主义增长。紧缩政策并不能恢复这种增长。对这些政策的政治回应，无论是英国脱欧进程、西班牙的紧缩政策，还是东欧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政府都没有对该体系的真正挑战做出回应。我们无法讨论如何防止战争。战争和混乱已经嵌入了这个腐朽体系的逻辑中。



U 型危机



L 型危机

J&J: 在你的文章《当代资本主义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The Return of Fascism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见《月度评论》2014 年 9 月 > 中，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为当今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创造了优渥条件。这从世界不同地区各种右翼势力的出现就可以明显看出。你认为经典法西斯主义会重演吗？

阿明:

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是不可持续的。这在南方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全球化给美国、日本和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此，这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它是不可持续的，这个体系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对其日益衰弱的一种回应。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西方重新出现的原因。

法西斯主义并不等同于专制的警察政权，它不拒绝具有不确定性的议会选举民主。法西斯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层在特定情况下可能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特殊政治回应。见萨米尔·阿明著《当代资本主义中法西斯主义的回归》（《月度评论》2014年）

西方向我们这些国家输出法西斯主义。以伊斯兰为名义的恐怖主义是当地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在印度有印度教多数派的反应。这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印度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虽然印度的大多数人都信奉印度教，但不信印度教的人也被接受。现在的印度政权是一种准法西斯主义或软性的法西斯主义。它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手软，它对特定的人群会越来越强硬。伊斯兰世界也有同样的情况，从巴基斯坦开始，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区域性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形式还渗透到了许多其他国家。

J&J: 你对政治伊斯兰的产生、它的意识形态和性质多有阐述。虽然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经常发表反对西方文化的言论，但你已经分析了这些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的情况。你如何解释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

阿明:

美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反政府运动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料到此事。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以为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 (Zine el-Abidine Ben Ali) 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跟他们的警察部队一样强势。法

国对突尼斯也是同样的看法。突尼斯和埃及的这些混乱的大规模运动缺乏策略，因而被局限在了旧有的体系中，并被消灭。但是，就在这两次运动爆发之后，西方政府意识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可能由于相同原因发生类似的运动。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发动“颜色革命”：一种表面上是群众革命实际上是被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革命。他们选择伊斯兰反动运动作为工具，而这些运动由西方的盟友海湾国家资助和控制。西方的策略在利比亚取得了成功，但在叙利亚遭遇失败。

利比亚没有反对现政权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发起运动的是一些小型的伊斯兰武装团体，他们立即袭击了军队和警察，并在第二天向北约、法国和英国求救！北约果真做出回应并介入。最终，西方列强达到了目的，也就是毁掉利比亚。今日利比亚的情况比当时糟糕多了。但这就是目标，这并不奇怪。他们的目标就是毁掉这个国家。

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叙利亚，反对政权的群众民主运动日益壮大，因为该政权为了继续掌权已经逐步接受新自由主义。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让伊斯兰运动介入，如出一辙地袭击了军队和警察并向西方国家求助。但是叙利亚政权有能力自保。美国期望的军队解散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只是虚张声势，他们只是少数被伊斯兰运动分子立刻收编的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不得不承认，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人民赢了，这意味着通过内战和干涉来摧毁该国的目标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没有能够破坏国家统一乃至潜在的统一。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当然要得到以色列的同意），让南斯拉夫的事件重演。他们失败了。

在埃及，美国在欧洲的支持下（欧洲只是一味跟从美国）选择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MB）作为替代。最初，在2011年1月25日，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共同反对这场运动。仅仅一周后，他们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革命。这是来自华盛顿的命令。另一方面，激进的左派对人民运动感到惊讶，没有心理准备；青年被分成许多组织，导致他们幻想过多，缺乏分析和战略能力。最终，这场运动达到了美国想要的结果：选举。在选举中，左翼支持的哈姆迪恩·萨巴希（Hamdeen Sabahi）获得了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相同的选票，大约有500万张选票。宣布穆尔西获胜的是美国大使馆，而不是埃及选举委员会！

穆斯林兄弟会的错误在于认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最终的、彻底的胜利，可以独立行使权力。所以，他们和各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包括军队。如果他们明智一些，与军方达成协议，就能继续执政并与军方分享权力。他们想大权独揽，方式恶劣而愚蠢，以至于胜利后仅仅几个星期就成了众矢之的。

这导致了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事件。全国有 3000 万人上街游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就在当时，美国大使馆不顾民众的呼吁，要求军方领导层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军队没有遵从指令，而是决定逮捕了穆尔西并且解散了所谓的议会——一个非经选举产生并完全由穆斯林兄弟会挑选的人员组成的机构。但是新的政权即军方政权还是延续了穆巴拉克和穆尔西追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J&J: 中国最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尽管它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它的经济成就通常被归因于自 1978 年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阿明:

我们必须从中国革命说起。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1789 年的法国革命、1917 年的俄国革命、1949 年的中国革命。古巴和越南也发生了革命。且让我们以这三个主要革命为例。伟大的革命都是远远超前于当时的历史进程的。

(1) 法国大革命。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1776 年的所谓美国大革命并没有瞄准这个目标。“民主”一词并没有出现在 1789 年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缔造者将民主视为一种危险，他们发明这个制度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奴隶制仍然是这个制度中决定性的一部分。乔治华盛顿就是奴隶主！相反，法国大革命试图将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在美国则是自由和竞争，即不平等条件下的自由。海地革命在 18 世纪晚期的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1917 年俄国革命提出了“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始于薄弱环节，但会迅速扩展”，即会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扩展。他预料革命会在德国爆发。历史证明他是错的。有这个可能，但并没有发生。真实历史的议程上并没有国际主义。

(3) 1949 年中国革命创造了“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它意味着全球范围的国际主义, 包括南方地区的农民国家。这是对国际主义的延展。这也不是一项立刻可以实现的议程。1955 年的万隆会议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回应, 其行动比较谨慎, 收效甚微。它被民族主义势力冲淡了, 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资产阶级国家计划的框架内。



正是因为伟大的革命超前于时代, 热月 (Thermidors) 和复辟才会继之而来。热月并不是复辟, 它意味着为了保持长期目标的活力而后退一步, 通过让步适时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热月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 1924 年。中国说发生在 1953 年赫鲁晓夫掌权的时候, 理由很充分, 但有些人认为这发生在之后 1964 年勃列日涅夫成为领导人的时期。然而, 资本主义复辟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才发生。那时, 社会主义的目标被放弃了。热月是退后一步, 而复辟则是放弃。



中国从一开始的 1950 年就有了热月。当有人问毛泽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他说: “不, 中国是一个人民共和国,”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用中国的表达方式说,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千年”。所以, 中国一开始就有了热月。后来有两次超越这一热月的努力。第一次是 1958 年到 1962 年的大跃进, 第二次是 1978 年到 1989 年邓小平时期。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复辟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独自执政, 还因为中国革命进程所取得的一些基本成果得到了保留。这是相当关键的。我在这里特指国家土地所有以及适应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的农业复兴框架下的家庭土地使用权。中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全球化战略:



第一条腿: 拒绝地缘政治帝国主义。

第二条腿: 接受经济新自由主义。

中国模式无意拒绝参与全球化——一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社会进程。这就是第二条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中国模式也没有完全照搬全球化的指标。中国参与了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有效控制。此外，与那些因为自由贸易、自由投资、金融全球化而被迫接受条件的国家不同，中国没有在全球化内运作。中国还没有参与金融全球化，而是保持了独立的金融体系，在形式上、实质上都是由国家管理的。这里有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起作用。全球化与中国的“两条腿走路”战略确实会产生冲突。帝国主义全球化和中国模式并非互补的战略，他们之间有冲突。

我的看法是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资本主义。它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倾向。它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国进行的大部分改革，特别是邓小平之后的改革，都是偏右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出现创造和扩大了空间。但是，到目前为止，以“两条腿走路战略”为特点的另一种力量得以保存，它与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互相冲突的。这就是我对当今中国的定位。





脱钩

J&J: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重要、最惊人的现象之一是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等经济学家已经用经验证明了它的规模。皮凯蒂说, 普遍征收的财富税或累进税是遏制这种不平等的机制。你认为这个办法在资本主义下可行吗?

阿明:

这些数据是正确的, 在现成的数据里算是最好的了。在过去 50 年里, 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然而, 至少可以说, 数据提供者的这些分析仍然很薄弱。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 这一事实需要加以解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各国不平等加剧的模式是否类似? 如果不是, 如果不平等现象存在不同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关于不平等的报告并没有对以下两种情况做出明显区分: (a) 伴有全体人收入增长的不平等加剧案例; (b) 伴有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不平等加剧案例。我们很有必要将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在中国, 大多数人的收入确实都得到了增长, 尽管一些人的收入增长要比大多数人高很多。因此, 在中国, 不平等现象增加伴随了贫困现象减少。印度、巴西等大多数南方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些国家中, 增长 (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高的增长) 只使少数人受益 (赤道几内亚等国是 1% 的人; 印度等国是 20% 的人)。这种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受益, 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贫困。一些指标本身不足以体现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

基尼系数并不全面。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可能是一样的,但貌似相同现象(即不平等加剧)的社会意义却截然不同。

就不平等问题的撰文者而言,他们的政策建议是有限而胆怯的,甚至是幼稚的。累进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受欢迎的。但是,只要没有广泛经济政策调整的支持,累进税的效果就是有限的。累进税加上继续执行允许垄断资本自由运作的所谓“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社会主流阶级会认为实行累进税的要求是“不可行的”,因为为垄断资本效劳的统治阶级会拒绝实施累进税制。确定最低工资的问题也是如此。最低工资当然是受欢迎的,但只要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结果就是收效甚微的。工资一旦提高,就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工资提高的好处就打了折扣。这是自由派提出的论点,他们根本反对通过立法确定最低工资的提议。

对现行体制下的法律提出任何挑战的目标都必须是争取更平等的教育、健康权益。但这种选择意味着会增加公共支出,而自由主义认为这种增加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如果没有系统的产业化政策支持,如果不是为了家庭农业的现代化,提供“更好工作机会”的打算就只是一句空话。中国正在做局部的尝试,但印度没有。

自由派坚持认为有必要减少公共债务。然而,我们需要解释公共债务增长的原因。是哪些政策造成了如此高的公共债务?这种增长就是自由主义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公共债务对垄断资本来说甚至是可取的,因为它为金融投资提供了特别多的资本机会。

皮凯蒂等撰写社会不平等文章的作者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提出我认为具有决定性的两个问题:

(1) 他们信奉自由开放的市场,主张尽量减少政府调控。

(2) 他们认为,除了允许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开放型全球化模式之外别无选择。对他们来说,这是全球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穷国最终会赶上发达国家。这些学者顶多是“改良派”,比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资本主义五百年来不平等发展愈演愈烈的历史至少应该让他们质疑这种说法,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质疑这种说法。

J&J: 对于制止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惊人增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阿明:

自由主义谴责各种为真正的发展制定务实政策的努力。所谓真正的发展,我指的是使所有人受益的发展。至少可以说,自由主义框架内的任何替代政策都是肤浅的。任何志在“崛起”的社会都无法避免一些基本问题:

- (1) 如何进入围绕本国群众需求建设现代化、综合型产业体系的漫长过程。
- (2) 如何实现家庭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主权。
- (3) 如何通过一贯的非自由主义政策来规划工农业的联合。

这三点意味着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政策暗示了两个方向:

- (a) 对市场的调控。
- (b) 对全球化的控制,即争取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以尽量减少全球霸权主义的负面影响。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为消除贫穷乃至最终减少不平等现象创造条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他南方国家则不然。在自由主义未受到猛烈抨击的情况下,关于贫穷和不平等的话题仍然只是纸上谈兵和天真的奢望。

J&J: 如何走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是一个重要问题。你建议,从当前的全球化脱钩应该是任何替代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和议程。我们怎样从全球化漩涡中抽身呢?如果我们胆敢脱钩,资本就会撤出我们的经济体。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威胁?对于一个敢于从新自由主义脱钩的国家,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阿明:

脱钩不是指自我封闭,而是拒绝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逻辑低头。萨米尔·阿明,《超越美国霸权》(Beyond US Hegemony), 2006年



“脱钩”是一句口号,我是把它作为口号使用的。脱钩的实际问题总是相对的。彻底脱钩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印度等大国可以将经济中 50% 甚至 70% 与之脱钩。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 80% 到 90% 的经济活动都脱钩了。但并不是彻底脱钩。他们仍然必须与西方国家、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脱钩并不意味着忘掉世界其他地方并且搬到月球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做是不理性的。脱钩只是意味着促使帝国主义接受你们的条件或部分条件。世界银行在谈到结构调整时,它对结构调整的看法总是单方面的。政策是由它来定的。脱钩意味着推动自己的政策。

以印度为例,它总是根据美国的要求进行调整。但印度可以选择不顺应帝国主义的道路。尼赫鲁在任内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但印度现在的莫迪政府并没有做此尝试。所以,必须再次考虑脱钩,可以做到。脱钩的空间是有的。当然,非洲、中美洲或亚洲某些地区的一些小国往往更难以同其他国家脱钩。但是,如果我们重新营造不结盟运动(NAM)的气氛,重新建立亚非拉国家间的政治团结,那么我们就不是少数派了,我们代表了全人类中的 85%。几十年之后,我们代表的人数应该还不止 85%。所以,我们并不是那么弱势,我们可以脱钩,而且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成功脱钩,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规模,还取决于我们的替代性政治集团,它将取代今天控制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核心政治集团。

J&J: 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 从殖民主义开始,再到全球化,“第三世界”边缘经济体与全球市场融合这一过程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实现现代化。印度前总理辛格曾感谢英国在印度引入了铁路。你所预见的现代化替代路径是什么? 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能成为现代社会吗? 脱钩是否意味着回到过去?

阿明:

当辛格感谢英国引进铁路时,他只是讲述了一个片面的事实。英国让印度工人建造铁路,但他们同时也摧毁了印度工业,当时印度工业比英国工业还先进。英国在摧毁印度工业的同时还将经济权力移交给了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在英国殖民之前,扎明达尔(指印度的世袭贵族)并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只是为各土邦向农民群体收取贡品和税收。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这一阶级成为了新的地主。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西北部的旁遮普以及西部、北部,大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形成的。英国人策划了一场土地掠夺。辛格应该记住,英国虽然引入了铁路,但就本质而言,也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暴行、破坏和压迫。

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是哪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现代性。我们不能说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现代性。它或许给印度带来了移动电话,但也让80%的印度人陷入贫困。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们必须对所谈论的现代性进行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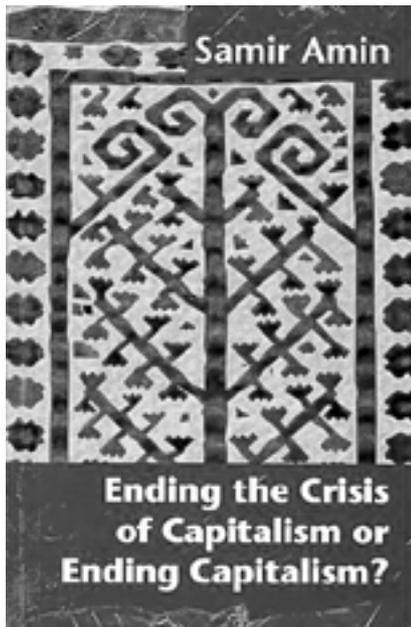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当然需要现代性。我们应该明白,脱钩不是回到印度过去的,回到殖民前或殖民时印度的道路。脱钩将给印度等国带来新的现代化模式。

J&J: 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左翼的前景和挑战是什么?

阿明:

在我的《结束资本主义危机或结束危机中的资本主义》(*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in Crisis*, 2010年)一书中,我发现,如果不逐渐摆脱这个制度本身,我们就无法摆脱这种危机模式。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短短几年内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都不行,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未来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制度把我们带入一场超级大战和生态浩劫之后才做出反应。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出反应。

这就要求左派大胆行事。我说的左派,是指激进的左派,其范围包括但远远大于第三国际的实际继承者,即各国共产党。目前,全球各地都有抵抗运动。有些地方的反抗运动非



常强大。劳动人民在进行完全合法的斗争，但他们处于守势。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捍卫过去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已逐渐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侵蚀。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但还不够。

这种防御性战略使垄断资本的权力体系得以维系其主动权。我们的战略必须从防御转向积极，即进攻的战略，以扭转权力关系。迫使敌人（即权力体系）对我们做出反应，而不是我们对他们做出反应。而且要让他们丧失主动权。我不是在狂妄自大。我手头并没有什么宏伟蓝图来指导奥地利或者中国、我的祖国埃及等国家共产主义者的行动。

但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必须就策略进行建言、讨论、测试及修正。这就是生活和斗争。我们不能停止。我想说的是，当务之急就是要大胆！

现在可以开始做出的改变就是群众运动从抵抗策略转向推动进攻的替代策略。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的只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即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希腊，我们看到欧洲的现有体制击败了第一次尝试。欧洲人民，甚至是非常同情希腊运动的人都没能够形成足以改变欧洲态度的强大声势。这是一个教训。强大的运动势在必行，而且我认为它们一定会在不同国家发生。比如，我与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不屈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运动组织的工作人员讨论过。我没有提出纲领性意见，但我大致提出了先从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金融银行机构）着手进行再国有化的战略。我说，再国有化只是第一步。这是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体系管理社会化的先决条件。如果仅仅停留在国有化的水平，那就等于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与私有制资本主义区别并不太大，人民会上当受骗。但作为第一步来策划，它就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度已经到了50年前望尘莫及的地步。占少数的几万家超大型公司以及数量更少

的（不到 20 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决定着一切的方向。顶级金融专家弗朗索瓦·莫兰（Francois Morin）曾表示，不到 20 家金融集团控制了全球统一金融货币体系 90% 的运营。再加上另外约 15 家银行，这一比例就从 90% 上升到了 98% 左右。这类银行的数量是极少的。这就是集中化，即权力集中。财产分配仍在进行，但已经不太重要了。问题在于财产的控制方式。财产控制的集中就导致了对政治生活的控制。

我们已经远离了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现在处于一党制的世界里。社会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如今都成了社会自由主义者。参与竞选的可能有两个政党，但本质上属于同一个政党。这意味着我们处于一党制之中。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从来都是同一个政党。欧洲的情况不太一样，因此，在过去，资本主义可以进行局部改革。二战后的社会民主福利改革就属于重大改革。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改革，哪怕跟南方国家相比，这些改革有一些维护帝国主义态度的意思。现在这些改革已经不可能了。一党制已经形成，正在失去合法性。这种情况也开了法西斯主义乃至新法西斯主义的风气，在世界各地都有冒头之势。这就是我们必须先废除这个体系再进行重建的原因之一。

抗议资本主义，不能只是抗议新自由主义损害人民利益的后果。抗议活动必须达到唤醒人民政治觉悟的高度。这种觉悟必须催生出广泛的社会联盟，在我们国家取代买办联盟，而在西方国家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亲帝国主义联盟。

J&J: 这些发生在世界不同国家的独立斗争，是否会对本性为国际化的广义垄断资本势力构成挑战？您对斗争群众中的国际合作需求或国际主义精神复兴的需求有何见解？

阿明:

作为未来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国际主义精神是必须复兴的，但我们也必须对之加以管理，也就是说，要努力将不同国家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这个国际不能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复制品。因为第三国际产生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并得到了一个强大新国家即苏联的协助，而我们的现状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为新的国际联系设想新的模式。

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有着潜在激进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必须团结这些力量。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共识比分歧更重要。

我们必须讨论分歧，而且要自由地讨论，而不是狂妄地认定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们的共同点更重要，而且是重建国际主义的基础。对于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都是如此。各国各有各的具体条件，各国的条件也不尽相同。基本观点相似，但条件不同。无论如何，这是我对开启这一进程的看法。

有些模糊地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同那些从没想到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人建立广泛的联盟。他们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改革的。那又怎样？如果我们可以为反对当今的资本主义而努力，就算迈出了第一步。

但我们必须提前规划新的国际格局，对此我并没有计划。这不是建个秘书处或领导组织机构的问题。首先，同志们必须坚信这一理念，并非所有人都是相信的。其次，欧洲已经放弃了反帝国主义团结和国际主义，转而支持所谓的援助和人道主义干预——包括轰炸无辜民众！这可不是国际主义。

我认为，国家政策（用这个词是因为没有其他说法）仍然是国家内部斗争的结果。无论这些国家是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这些斗争都发生在确定的国境之内。必须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平衡，继而使我们能够改变国际间的力量平衡。

我们必须重建一种新的国际格局，一种属于劳动人民等群体的国际格局。其范围远大于无产阶级，还包括一部分农民及各阶层。在印度，你会发现，如果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他们具有浅显的无产阶级意识）没有与印度农村社会或农民结成联盟，那么反抗力量就无法建立。它们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代表它们的可以是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必须了解我们的共同点，我们的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动员阶级属性不同但同为当今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各类人群的广泛政治联盟。



印度记者吉普森·约翰（Jipson John）和吉夫泰什·P·M 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们的报道刊登在多个期刊上，包括《前线》（*Frontline*）、《连线》（*The Wire*）、《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和《月度评论》。他们在对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系列采访。今年底，采访内容精选将由新德里的 LeftWord Books 出版。联系两位记者可发邮件至 jipsonjohn10@gmail.com 和 jitheeshpm91@gmail.com。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